

# 對「積極不干涉」經濟政策的再審議

呂明華博士 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呂明華

特首梁振英提出政府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涉」管治思維，轉而「適度有為」地引導和推動經濟發展。事實上，香港經濟取得的輝煌成績，是自由經濟原則下成長的最佳案例，是香港工商界努力的結果，並非「積極不干涉政策」所造就的。多年來本港經濟仍然處在服務型的單行道上蹉跎，當下的經濟形勢和各國的產業實力，已經不允許香港繼續實行單打獨鬥博成功的模式。「適度有為」的思路，既有助香港在新的經濟形勢下迎接挑戰，採取積極措施以解決難題，又能推動經濟向前發展，是造福香港，給城市帶來新希望的大好事，應該受到歡迎。

關於政改的爭論，已消耗大量社會正能量，也令香港陷入政爭和撕裂的泥潭。縱然如此，香港社會不能停頓，經濟仍需要向前發展。所以特首梁振英在政改後及時提出，要集中精力於經濟及民生，最近更著文提出政府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涉」管理思維，轉而「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經濟。管理思維改變後，政府將會更積極地推動經濟發展，這本來是造福香港的大好事，卻遭到社會上一些意見的挑戰和批評。他們認為「積極不干涉政策」行之有效，不應該放棄，而「適度有為」則恐怕變成長期干預。其實工業界和科技界在上世紀80年代已建議政府放棄「積極不干涉政策」，而需要積極推動製造業。現在再依所知，談談其背後的理據和因由。

## 「干預」、「不干涉」和「積極不干涉」

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態度，可以是干預或不干預(即自由放任)。在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對經濟的發展，一般都採取放任態度，借市場力量去調控。在香港，由19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開始，一直採取「不干涉」政策，他說：「一般而言，

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可見當時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是恰當和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但是到了1970年代，夏鼎基上任財政司後(1971-1981年)，對經濟的態度，慢慢轉向為「積極不干涉」。1980年他在一次演講中這樣說：「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例如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和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筆者在1984年的一個「高級公務員課程」中曾與夏鼎基探討過「積極不干涉政策」之主旨和意義。據筆者理解，在經濟進行正常時，政府對市場不會進行干預，但是當經濟出現新形勢時，政府需要在研判後作出積極的決定，採取積極的措施以解決問題。可見「積極」並非把「不干涉」推向極端，夏鼎基的談話給筆者印象頗深。

## 香港經濟發展回顧

香港經濟是由外向型製造業帶動的，而製造業踏上快速道是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其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來自大陸的資本家帶來了資金、設備和技術，迅速展開了紡織、漂染和製衣工業，產品出口到全世界。另一方面，50年代中有多間外國的電子公司開始來香港設廠生產各類產品，如零件和單晶體電子收音機，為香港培養了第一代電子工業人才。數年後，他們開始創業，啟動了本土電子工業的蓬勃發展。在此後的20多年，香港的製造業持續擴大，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塑膠花、假髮、塑膠產品、電風扇、各類玩具等。製造業的輝煌發展，帶動了運輸業和航運業、金融和保險業、旅遊業、服務業和內部消費，為香港帶來一片繁榮景象，市民安居樂業。

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台灣和新加坡的產品開始進入國際市場，成為香港的強勁競爭對手。另外加上持續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租金和勞工成本已大幅度上升，廠商開始感到經營困難。自從內地於1978年開始實行開放政策後，香港的製造業開始北移到深圳及其他附近城市。這個情況持續至上世紀90年代中，由於絕大部分工廠已內遷，造成香港工業空洞化，香港失去了龐大的外匯收入和近百萬個工作職位，其負面影響深遠，直到今天。這是世界上獨立的發達經濟體中的特例。

## 經濟發展需要好政策

現在來看，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不但反映管治團隊的理念、承擔、智慧和目標，也關係到當時實際狀況和需要。在香港工業萌芽和發展初期及其後十多

年，香港處於先發位置，佔盡市場優勢，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其實是經濟發展的助力，讓工業家各展所能，所以是上上策。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後，香港需要面對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的競爭。世界經濟形勢在轉變，在此形勢下，所以提出「積極不干涉政策」。這個政策轉變，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這可能是為政府提供理據，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採取措施為改善製造業的困難處境而有所作為，對工業界有所裨益。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港英時代的「不干涉政策」和「積極不干涉政策」，都只是順應時勢為其「無為而治」提出的「偽政策」而已。其中的「積極」只是為實際「不干涉」設置更高門檻，提供理據。但是無論如何，直至夏鼎基於1981年升任布政司後，並沒有跡象顯示他曾為挽留香港製造業免於北遷而作出「積極」的干預。現在反思可見，當年所謂「不干涉」和「積極不干涉政策」本來都是針對製造業而設的經濟政策，既然港英政府從來沒有所謂經濟政策，而香港的製造業只是受外力引導而發展起來的產業，那麼製造業從香港經濟中消失，便不是港英政府最關心的事了。這與主權政府的新加坡恰好相反。新加坡有產業政策，竭力挽留製造業外遷，至今製造業產值仍佔GDP逾20%，並維持大量就業職位。相比之下，兩個政府的管治，優劣即見。

現在特首梁振英提出要摒棄過時的經濟政策，要有所為，這是給香港新希望，應該受到歡迎。希望政府提出新的思維和前瞻性的產業政策，建立有實戰經驗的團隊來統籌、引領、推動和支持新產業的發展。

# 梁家傑拍枱趕人自暴其醜

徐庶

湯家驊在日前反對派的退思會上被梁家傑拍枱趕走，鬧得沸沸揚揚。一向以「藍血」精英領袖形象示人的「袋中梁」，近年走激進路線，人也變得暴戾霸道涼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連創黨黨友湯家驊也因政見不同而容不下。激進路線不得人心，在反對派內部亦屢遭挫敗，梁家傑頂住道氣，沮喪萬分，終於情緒失控，行為與有「癲狗」之稱的黃毓民不相伯仲，正中「心火太盛常出醜」。

梁家傑過去一年當了反對派飯盒會的召集人，成為反對派的發言人和代表，在「佔中」、政改問題，對抗中央反對特區政府均不遺餘力，態度越趨激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向激進靠攏，梁家傑也變得斯文日少，小小刺激就暴跳如雷。

梁家傑一向反對與中央對話，更希望借「佔中」一周年的機會再搞事，再挑起對抗。自從港澳辦副主任馮魏和民主黨成員會面、反對派3成員訪京與中央官員溝通後，現在形勢發生逆轉，反對派不少人亦開始說應該和中央溝通，傾向民主黨的對話路線。民主黨更認為，在區議會選舉即將開始的時刻，重提「佔中」，強調對抗，已不合時宜，會趕走溫和選民，區議會選舉必然大敗。所以，並不主張高調紀念「佔中」。梁家傑見炒熱「佔中」不成，本已一肚火，這個時候湯家驊向反對派通報和中央會面的情況，梁家傑如同被刺痛了神經，積壓憤怒終於控制不住，將怒火全噴向湯家驊，全然不顧往日的交情。

梁家傑無奈、狂躁、失態，其實是對形勢發展心灰意冷。事後《蘋果日報》的社論露了端倪，道出了梁家傑拍枱的原因。該社論酸溜溜說：「是不是溫和派才能與中共對話，才能獲得政府資源，而激進派就要受到打壓？」這說明，民意主張溝通，形格勢禁，激進派已經到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為了展示激進派在反對派中的地位，更為了挽回作為「龍頭」的面子，所以梁家傑要搞一點小動作洩憤，落湯家驊的面。

但是，梁家傑作為「龍頭」時日無多了。他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發出哀鳴，說要拜拜了，不再做立法會議員，也不會再擔任公黨的任何職務。在這篇題為「萬物有時退有時」的文章中，梁家傑「盡爆心中情」：「爭取普選這項苦差，自問努力嘗試突圍，但可能實質有限，環境變了，或時機未到，沒有寸進，普選目標繼續遙遙無期，不能說不沮喪。」

萬物有時，就是講發展是根據規律的，時候到了，任何人都無法挽回。當前香港的大潮流是落實「一國兩制」。梁家傑企圖開歷史倒車，猶如螳臂當車，必然眾叛親離，事事不如意，撞板之後必然「心火太盛常出醜」。梁家傑，快退下來，心情就會好一些。

對於特區政府未能於立法會夏季休會前成功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我們深表遺憾。這全因激進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段阻延所致。我們認為，這對香港的經濟而言實在可惜，因為在內地正向全球開放經濟之時，香港若未能成功轉型，經濟競爭力日漸萎縮，已為不爭的事實。

雖則本地的創科研究與發展，在各方努力下亦已開始萌芽。舉例說，華為、華大基因、聯想和TCL等內地科技巨頭已在香港成立研發中心，但整個社會對創科業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香港經濟仍倚賴傳統支柱產業，但外圍經濟環境變化迅速，加上內地急速向世界開放，區內競爭更趨激烈，均對香港帶來挑戰和壓力，香港必須在科技創新上有所突破，否則就會「死路一條」。我們深信創科局成立，將大大有助於政府構築多元化經濟，並在國家進一步開放之中有所得益。

現在的情況就如西諺所云：「我們猶如那些在隧道末端找尋光明的年輕人」。香港若能在產業上有所突破，便可以有更好的發展、有更多較高薪職位和向上流動的機會。所以我們呼籲，政府應更積極地做功夫，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利用本地各間學府資源，提供這方面的訓練。只有我們的城市愈向知識型社會的方向發展，對科研人才的需求才會愈大。

我們贊同政府的計劃，在未來兩年更專注經濟民生，擺脫政爭的困擾。事實證明，經濟和政治問題糾纏不清，特區政府及全社會勢必要花更大力量在拆解政治矛盾上。實際上，發展經濟、改善市民生活，已是刻不容緩。

我們懇請所有議員，在立法會十月復會時，不論持何立場，都應與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展開理性合作，為公眾謀利益，這是議員們責無旁貸的責任。我們希望在財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便通過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這也是財委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重要事務。

香港公民協會

# 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

楊育城 九龍東潮人聯會會長

歷史是一面映照現實的最好明鏡，也是一部絕好的愛國主義教科書。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今天，香港在祖國的大懷抱中，在國家日漸國強民富，繁榮昌盛，在復興中華民族大業中，在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的大計中，希望本港的青少年在重溫抗戰歷史的過程中，樹立家國情懷，多一點明禮知恥、崇德向善，多想想香港的未來和自己的未來，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 大閱兵點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筆者參加香港特區代表團赴京參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歸來已有數天了，激動心情仍未平息，仍處於興奮及感慨之中，甚至有些不吐不快，為此特提筆一敘。

9月3日上午天安門前的閱兵，讓人大開眼界，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空前高漲。親睹三軍部隊的風采，令我深刻體會到何為威武之師、正義之師、和平之師；觀賞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文藝晚會，更是又一次震撼我心靈的表演。70年前，山河破碎，風雨飄搖，南京大屠殺的哀嚎慘叫，日軍的暴行激起民眾保家衛國的堅定決心。從祖國的白山黑水之間，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不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拋家別子，走向前線，高唱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多少仁人志士抱着「向敵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境」信念，血灑疆場。無數人築起血肉長城，與侵略者作奮勇抵抗，八年抗戰中，中國軍民死傷人數3,500萬，直接、間接經濟損失達5,600億美元之巨，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浩劫。數不清的海外僑胞毀家紓難，捐錢捐物，源源不斷地把抗戰物資運往國內各戰場。中華民族表現出如此強大的民

族凝聚力，如此強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驚天地，泣鬼神。我不能不說使每個觀眾都受到了莫大的愛國主義啟迪及教育。

習主席在大閱兵的講話中提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面對侵略者，中華兒女不屈不撓、浴血奮戰，徹底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捍衛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的文明成果，捍衛了人類和平事業，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經歷了戰爭的人們，更加懂得和平的寶貴。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是的，歷史是一面映照現實的最好明鏡，也是一部絕好的愛國主義教科書。落後就會挨打，軟弱必招欺凌，這是鐵一般的歷史定律。今日的世人必須要牢記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歷史，進而深刻了解並牢記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重要性。一個國家，光有和平的願望不夠，擁有和平的力量才是根本，沒有強大的國防，就沒有國家和人民的幸福安寧。

八年抗戰中，香港同樣遭受到日軍的侵佔

和蹂躪，香港市民與內地同胞一樣對侵略者的罪行採取了英勇的反抗和還擊，名聞遐邇的東江縱隊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歷史再一次證明，團結就是力量，團結起來才能捍衛國家的完整與神聖的主權，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與祖國間一直是血脈相連、同氣連枝的命運共同體。今天，香港在祖國的大懷抱中，在國家日漸國強民富，繁榮昌盛，在復興中華民族大業中，在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的大計中，香港究竟能夠擔當什麼角色，又能否趕上時代的步伐？

不久前在上水，再次出現以驅趕水貨客為名，實為針對內地旅客的暴力示威行動。網上名為「上水人上水事」及「本土同盟」的族群，呼籲市民參與「光復上水，捍衛我城」行動，示威者更是高舉港英旗在上水站及石湖墟一帶遊行，對附近的藥房及水貨客予以示威，肆意指罵旅客。對於這些「本土派」們，筆者不禁要問：香港已經回歸祖國18年，為何還高舉港英的旗幟？難道中國不是你的祖國？「趕客」行動不但影響本地零售業業績，而且專門攻擊內地旅客，顯然已仇視內地同胞，仇視自己的手足。想一想，如果沒有當年四萬萬同胞的共同抗日，沒有前輩的浴血奮鬥，又會有今天的和平生活？所以希望這班「熱血青年」還是多重溫一下歷史，多認識自己的老祖宗，多一點明禮知恥、崇德向善，多想想香港的未來吧。



楊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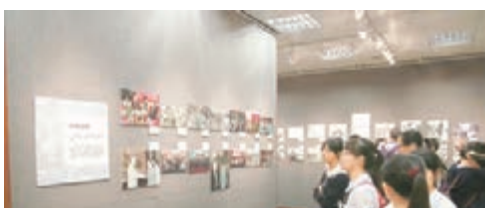
陳志豪 香港協協青年聯會副會長

# 香港急需確立基本的政治共識

筆者曾經聽過一個笑話：有兩本書是幾乎所有香港人都聽過，但不一定會看的，一本是《聖經》，另一本則是《基本法》。誠然，這個笑話不假。

回歸以來，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官員曾多次表示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認識有偏差，未能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需要繼續加強《基本法》的教育與宣傳工作，我是完全同意的。

不久前，筆者應邀到一些中學與學生討論時政議題，過程中，有幾位學生表示不滿中央的



加強青年對《基本法》的認識，宣揚正確的政治共識。

對港政策，認為「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說實話，從網上討論可見，這的確代表了一部分香港青年對「一國兩制」的看法。筆者很想了解清楚這幾位學生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並要求他們舉出一些例子，有學生表示：「既然香港係實行『一國兩制』，為何我們需要學習國民教育？」也有學生說：「香港不是實行『一國兩制』嗎？為何香港的政制發展需服從中央的決定？」更有學生表示：「為什麼香港人要愛國？」毫無疑問，這些偏見與誤解都是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有偏差的表現。事實上，包括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政改須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央期望港人更加愛國愛港等，均沒有抵觸《基本法》的條文與精神，當然不違反「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一個具體和清晰的概念，應用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有一套，是不能主觀地任意詮釋的。至於「一國兩制」的具體面貌是怎樣？就是《基本法》了。對「一國兩制」作出評論是不能抽離《基本法》的。《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具體內容，

但凡合乎《基本法》的精神和條文的，便合乎「一國兩制」；但凡違反《基本法》的精神和條文，就等於違反「一國兩制」。這條客觀的準則，不但規範了香港人，也規範了中央，連中央亦得遵從，否則便等於撕毀「一國兩制」。進一步說，若果有人認為中央或特區政府違反了「一國兩制」，作出指控的人亦有責任指出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政策違反了《基本法》哪一條，否則便相當於政治抹黑。無疑，這番論述是很初階的，無非是「一國兩制」的入門概念，但搞不懂的人實在也不少。連最基本的政治原則的共識都未有成功建立，社會上的政治爭端又怎會少？

香港實在需要更多人站出來參與《基本法》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尤其是闡述清楚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各項憲制性規定，讓市民更準確把握《基本法》的條文和精神。尤其要嚴正駁斥一些扭曲了「一國兩制」的誤導性言論，避免一些市民誤解了「一國兩制」的面貌，然後又轉過頭來批評中央或特區政府違反「一國兩制」。